
目录 CONTENT

► 青年评论

贺博	于欢笑中探寻教育真义	
	——评《三傻大闹宝莱坞》	/ 3
丁怡萱	“孔乙己的长衫”，窥困境之困境	/ 5
杨江卫	不畏浮云遮望眼，要留清白在人间	
	——抵制营销号造谣，守护网络清朗空间	/ 7
陈红	当“网红审美”成为新时代的裹脚布	
	——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当帮凶	/ 10
张文燚	没有终点的邮路，永不褪色的抵达	
	——《那山那人那狗》影评	/ 12
杨赫祺	旁观者的深渊	
	——河道英视角下的《黑暗荣耀》权力寓言	/ 14
张嘉妮	《奥本海默》：诺兰的传记电影表达	/ 16
宁艳琪	被盲盒撬动的童年	
	——警惕“小马宝莉”背后的潘多拉魔盒	/ 18
邓雅妮	灰绿色的时代	
	——浅评莫言《蛙》	/ 20
丁靖航	警惕道德绑架，重塑文化自信	

	——被异化的文化支持：刷票房等于爱国？	/ 22
秦雪雲	围城高筑，亦需让心启航	
	——读《围城》有感	/ 24
范诗涵	裂隙中，依旧向阳生长	
	——从女性主义电影看女性叙事成长	/ 26

1. 于欢笑中探寻教育真义

——评《三傻大闹宝莱坞》

贺博

2009年，印度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以其诙谐荒诞的叙事风格风靡全球，票房成绩斐然。它表面是一部能让人开怀大笑的喜剧，实际上却如同一把锐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影片借助三位工程专业学生的校园经历，深刻地揭示出填鸭式教育对人性的压抑，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

影片的人物塑造别出心裁，通过三位主角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呈现出一场“教育异化”的真实写照。法兰钟情摄影，却拗不过父母的期望，无奈走上成为工程师的道路。这种父母把自己未竟的理想强加到子女身上，打着“为你好”的旗号磨灭孩子个性的现象，在东亚社会屡见不鲜。法兰那句“要是我是一台相机，您会为我感到骄傲吗？”满是无奈与不甘，直戳工具化教育的荒谬之处。拉祖肩负着家庭脱贫的重任，他在考试前向神像祈祷，甚至因害怕失败而选择自杀。这些情节把功利主义教育的危害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在盲目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迷失自我，变成了

焦虑的“机器”。而兰乔作为理想主义的代表，和法兰、拉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敢于挑战权威，秉持“追求卓越，成功自会随之而来”的理念。他的角色塑造遵循了影评理论中“艺术典型”的原则，通过一些极端行为，将现实教育中的矛盾展现得更为突出。三位主角的命运相互交织，从服从性、功利性以及创新性这三个层面，对当下的教育体制展开了有力批判。

在叙事手法上，导演拉库马·希拉尼巧妙地运用电影语言，进一步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对比蒙太奇手法在影片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场的自杀场景和结尾的喜剧性反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不仅暗示了教育悲剧的普遍存在，也让观众看到了突破困境的曙光。“病毒”院长办公室里的机械钟象征着束缚，而兰乔自制的无人机则代表着自由，二者构成的视觉隐喻，与爱森斯坦蒙太奇理论中“冲突产生意义”的观点相契合。影片中的符号体系同样寓意深刻，多次出现的“太空笔”，象征着僵化的思维方式。院长对美

国航天局高价笔的追捧，和兰乔用铅笔轻松解决难题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辛辣地讽刺了人们对权威的盲目迷信。在“盐水导电”的实验场景中，兰乔把教科书上的定义改为“任何液体都能导电”，这一细节有力地打破了标准化答案的束缚。

从主题深度来看，影片没有局限于对个人奋斗的简单赞美，而是直接指向了系统性的困境。帝国理工学院（ICE）“竞争即生命”的标语，在影片中具象化为自杀学生的悼念墙，深刻地揭示出竞争至上的教育理念对生命价值的侵蚀，凸显了教育流水线反人性的本质。院长“病毒”这个角色充满了讽刺意味，他既是教育体制的受害者，又是体制弊端的传播者，体现了体制对人的双重异化。查尔图的“成功学演讲”与兰乔的“知识在于应用”形成对立，揭示了教育领域中实用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分裂。影片结尾出现的“卓越研究院”，看似是理想的教育场所，实际上暗示了教育改革不能坐等体制突变，而要从细微的实践做起。

在 2025 年的今天，随着 DeepSeek 等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逐渐渗透，《三傻大闹宝莱坞》所表达的批判意义愈发凸显。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

加剧了教育危机，当 AI 能够轻而易举地生成论文、解答试题时，填鸭式教育的弊端便彻底暴露。影片中只会死记硬背的查尔图，就像是当代那些依赖 AI 代笔的学生的真实写照。而兰乔发明助产仪的情节，不仅展现了他将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更体现出工程师应有的人文关怀，证明了技术最终要服务于人的价值。这也回应了王小鲁对 AI 影评的警示，即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而忽视人性温度，会导致思想的匮乏。

《三傻大闹宝莱坞》成功地用商业喜剧的形式，承载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在教育逐渐沦为数据优化目标的当下，这部影片时刻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教育应该是点燃学生内心对知识的渴望之火，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而不是把他们的大脑当作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正如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所说：“真正的光明并非永远没有黑暗的时刻，只是永远不会被黑暗所吞噬。”在 AI 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像兰乔一样保持清醒，让教育回归到关注人性、照亮人性的本质上来，而不是盲目地服从各种所谓的标准。

责编 熊若霖 江志强

2. “孔乙己的长衫”，窥困境之困境

丁怡萱

鲁迅小说《孔乙己》近期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在当代社会话语场中，“孔乙己的长衫”这一意象迅速走红，引发广泛共鸣与热议。它犹如一把锐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当代青年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复杂境遇与内心挣扎，这不禁让我们深思这个长衫真的脱得下吗，又该如何脱下长衫，是什么让当代青年在泥潭中痛苦挣扎。

这一流行语源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他身着象征读书人体面的长衫，却在落魄的现实中陷入尴尬境地。在文中孔乙己虽生活窘迫，但是始终不肯脱下长衫。因为那是区分他与普通劳动者的重要标志，坚持着他心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老话。也正是这样一种高傲，这样一种对劳动的鄙夷，他最后失去了行动能力，默默无闻的凄苦死去。鲁迅先生作为近代著名的小说家，以笔为剑，讽刺社会。这是当时社会的写照，但似乎到今天仍然适用。在当下社会，经历疫情经济尚未复苏，市场面临饱和，而青年们接受多年教育，被父母教育“知识改变命运”，怀揣知识与梦想步入社会，恰似身披无形的“长衫”。这“长衫”是家庭与社会寄予厚望的压力，是对高

学历对应高回报的执念，是在理想与现实落差间徘徊的迷茫。许多大学生在求职时，因放不下身段从事基础性工作，在就业市场中遭遇瓶颈，高不成低不就。从社会层面看，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就业结构的不合理、社会评价体系的单一等因素，共同编织成这一困境的罗网。

这样看来似乎是当代青年不愿意脱下长衫，不愿去卖苦力，去接受自身的平庸。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浙大毕业生孟伟在2021年迫于经济压力，选择送外卖赚钱来维持生计。他将自己的经历发布到网上，“浙大博士生送外卖”这一话题引起大众的关注。这位新时代青年脱下了“长衫”，选择用自己的双手来供养自己与家人，但这时也有许多人也传来了鄙夷的声音，似乎博士生不能送外卖，似乎对蓝领工作者充满了厌恶。这难道不是外界给予当代青年的压力吗？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学生真的能脱下“长衫”吗？我们不仅要把这件事归结到大学生的内心，更要让社会上的人都明白用自己的双手换来的生活并不丢人。这样才能促使当代青年明白，我不仅可以用知识，用双手也不丢人。

当代青年并非全然被动地困守在困境中，他们正积极探寻出路。一方面，部分青年转变观念，主动脱下“长衫”。他们不再被学历束缚，投身新兴行业，如电商、自媒体、快递物流等，以灵活多元的就业形式实现自我价值。这些青年如同在荆棘中开辟新径的开拓者，用行动诠释着“英雄不问出处”。另一方面，一些青年选择改良“长衫”。他们在坚守专业理想的同时，积极提升自身综合能力，通过跨学科学习、技能培训等方式增强竞争力，力求在传统领域中创新突围，就像在古老建筑中加装现代化设施，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社会各界也应成为青年破局的有力助推器。政府应持续优化就业政策，加大对新兴产业扶持力度，拓宽就业渠道；教育部门需深化教育改革，注重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培养，使教育与社会需

求无缝对接；企业应摒弃学历歧视，构建公平合理的用人机制，为青年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这也不禁让人想起引发网友热议的“秋招冬招”。在校招上没有拿到 offer 的大学生，去了某些网红的直播间，想要谋求一个“职位”。在那大学生感受到了认同感，没有学历的鄙视链，没有来自面试官的冷嘲热讽。这件事也让我们思索，我们何时才能逃出学历鄙视的怪圈，真正做到人人平等，用实力来权衡一个。唯有社会各界一同发力，当代青年才不会陷在泥潭中无法自拔。

“孔乙己的长衫”所引发的思考不会戛然而止。它是时代的警钟，长鸣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当代青年当以理性与勇气，或脱或改这无形的“长衫”，在时代浪潮中找准航向，破浪前行。而整个社会也应携手共进，为青年创造良好环境，共同书写青春与时代交相辉映的壮丽篇章。

责编 罗奕 江志强

3. 不畏浮云遮望眼，要留清白在人间

——抵制营销号造谣，守护网络清朗空间

杨江卫

在网络信息洪流奔涌的时代，营销号造谣这股浊流却肆意横冲直撞，严重污染着网络环境，侵蚀着公众的信任根基。“谭警官因拦奔驰车被迫离职”与“冰花男孩捐款被截留”这两起谣言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营销号造谣的恶劣行径及其背后盘根错节的复杂问题。

回顾“谭警官事件”，当时谣言甚嚣尘上，宣称谭乔警官在《谭谈交通》节目中拦下一辆遮挡号牌的奔驰车后，因车主背景强大而惨遭开除，离职时间被传得有板有眼。可事实呢？视频拍摄于2012年，谭乔警官2018年才递交辞职报告，且当时未获批准，还在单位从事三年后勤工作，直到2021年才正式离职。而且，从警衔变化来看，2012-2013年他的警衔还得到了晋升。很明显，谣言与事实严重不符。谭乔警官辞职更多是源于职业压力和个人性格与体制内工作的矛盾。这起谣言不仅给谭乔警官带来了精神压力，还误导了广大网民，破坏了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再看“冰花男孩事件”，谣言声称其获捐70万却仅到手500元。但实际情况是，相关募捐活动面向所有经济困难儿童。王福满所在学校接收善款后，他和同学们都获得了500元补助，此外他还收到大量爱心包裹和超万元善款。他的父亲也获得工作机会，家庭生活得以改善。鲁甸县借助这些善款，大力改善了众多学校的教育条件，让更多孩子从中受益。这起谣言无视背后的爱心传递和社会积极影响，恶意误导公众，给当事人和社会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这两起典型谣言事件，深刻反映出营销号造谣现象背后的多重深层次原因。首当其冲的便是“流量至上”的错误观念作祟。在当今互联网商业环境下，流量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部分营销号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分得一杯羹，不惜抛弃道德底线和职业操守，将造谣作为吸引眼球、获取流量的“捷径”。他们精心炮制各种耸人听闻的虚假消息，利用大众的猎奇心理，从明星绯闻、名人隐私到社会热点事件，无所不用其极地编造故事，煽动公众情绪，以达到增加点击量、关注

度的目的。这种短视行为，不仅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破坏了网络生态的健康发展。

网络监管机制的不完善，无疑为营销号造谣提供了滋生的温床。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广泛性和匿名性等特点，信息传播速度极快，范围极广，监管难度巨大。相关部门在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时，往往存在监管滞后的问题，难以及时发现和制止营销号的造谣行为。即使发现了造谣内容，现有的处罚措施也相对较轻，违法成本远远低于造谣所带来的收益，这使得一些营销号有恃无恐，屡教不改。这种监管不力的现状，让营销号造谣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严重威胁到网络空间的信息安全和秩序稳定。

营销号造谣所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且深远的。从个人层面看，谣言对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谭乔警官原本凭借《谭谈交通》节目，在公众心中树立了正面、积极的形象，却因谣言无端遭受质疑和诋毁，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其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冰花男孩”王福满及其家人，在承受生活压力的同时，还要面对谣言带来的舆论压力，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个人隐私也被无端侵犯。这种名誉上的损害，往往需要当事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澄清和修复，甚至可能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从社会层面而言，营销号造谣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众多，但辨别信息真伪的难度也随之增加。营销号传播的谣言充斥在网络空间，让公众在海量信息中迷失方向，真假难辨，增加了信息筛选成本。当公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甄

别信息时，不仅影响了他们获取真实、有价值信息的效率，也可能导致他们错过重要的信息，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在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社会安全等领域，谣言的传播甚至可能引发公众恐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正常运转。

谣言还会削弱社会的信任基础。网络作为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沟通的重要平台，其信任体系的建立至关重要。然而，营销号的造谣行为不断挑战公众的信任底线，让人们在网络信息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当公众对网络信息失去信任，不仅会影响网络平台的发展，也会对整个社会的信任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这种信任危机一旦形成，将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长期的阻碍。

面对营销号造谣这一严峻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抵制。**平台作为网络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应承担起主体责任。**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对营销号发布的内容进行实时监测和筛选。通过对关键词、内容模式等进行分析，及时发现潜在的造谣信息，并采取删除、封禁账号等严厉措施，从源头上遏制谣言的传播。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用户举报机制，鼓励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监督。为用户提供便捷的举报渠道，对举报内容进行及时处理，并对举报属实的用户给予一定的奖励，形成全民参与打击谣言的良好氛围。

监管部门在抵制营销号造谣中也肩负着重要使命。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营销号的行为规范和责任义务，对造谣行为制定详细、具体的处罚标准，提高违法成本。加大对营销号的监管力度，加强与平台的协作配合，建立信息

共享机制，实现对营销号的全方位、动态化监管。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类造谣传谣行为，对违法违规的营销号进行严肃处理，形成强有力的法律威慑。

对于广大网民来说，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是抵制谣言的关键。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时，要保持理性和批判性思维，不盲目轻信、不随意转发。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工具，对信息的来源、真实性进行判断。多关注官方渠道、权威媒体发布的信息，遇到可疑信息时，及时通过官方渠道或权威媒体进行核实。同时，积极传播正能

量，弘扬正确的价值观，用优质的内容和理性的声音去影响身边的人，共同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抵制营销号造谣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持久战。只有平台、监管部门和网民齐心协力，从观念转变、技术防控、法律约束等多个方面入手，才能彻底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还网络空间一片晴朗。让我们携手向营销号谣言“亮剑”，捍卫网络真实净土，让网络成为传播知识、弘扬正能量的重要阵地，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责编 金俊志 苏嗣淼

4. 当“网红审美”成为新时代的裹脚布

——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当帮凶

陈红

当代审美异化最吊诡之处在于，我们既是被规训的对象，又成为规则的捍卫者。某社交平台内部数据显示，用户上传的生活照平均经过 2.7 次美化处理，其中 67% 会刻意缩小脸型。这种数字时代的集体化妆仪式，正在重塑整个社会的认知基准。

在杭州某直播基地的墙上，挂着这样一句标语：“要么美得惊人，要么丑得惊人”。这句话赤裸裸地揭示了网红经济的底层逻辑——注意力即生产力。某 MCN 机构课程 PPT 上清晰罗列着“爆款长相公式”：眼间距是脸宽的 $\frac{1}{5}$ ，鼻翼宽度与眼距等长。这种将面部特征量化为工业参数的疯狂，催生出令人瞠目的产业链。更荒诞的剧情在医美诊室上演。某整形医院推出的“网红套餐”包含 12 个项目，从“小腿神经阻断术”到“颅顶增高术”，价格相当于二、三线城市一套房的首付。值得玩味的是咨询师的话术：“现在做主播的谁不微调？你看到的自然脸都是精心设计过的。”数据显示，我国医美消费者中 00 后占比已达 19%，其中 13% 承认受到网红影响。

当某少女因模仿网红减肥法导致器官衰竭的新闻登上热搜时，相关话题下最热门的视频仍是“七天瘦出漫画腿”教程。

表面上，社交媒体赋予了普通人展示自我的平台；实质上，算法正在构建新的审美霸权。某平台内部流出的推荐机制显示，符合“白幼瘦”特征的内容初始流量会高出 37%。这种技术偏见导致的内容同质化，形成可怕的马太效应——越是迎合标准的内容越容易爆发，继而强化标准的统治地位。教育学者王敏跟踪研究了 100 名小学生的绘画作业，发现 78% 的女生会自发将人物画成“大眼睛、尖下巴”。在“你觉得自己哪里不好看”的问卷调查中，这些孩子列出的部位与网红最常修饰的部位高度重合。这种潜移默化的规训力量，比任何教科书都来得猛烈。当我们嘲笑中世纪束腰的愚昧时，是否意识到“腰围挑战”不过是数字时代的变形束腰？

转机往往出现在系统最疯狂的时刻。去年爆火的“毛孔展示大赛”意外掀起反审美霸权的浪潮，参与者们晒出痘痘、皱纹甚至妊娠纹，最多

点赞的评论是：“原来皮肤是会呼吸的。”某百万粉博主发起“真实身材挑战”，第一条展示小肚子褶皱的视频播放量突破两千万。这些微弱的抵抗正在汇聚成新的力量。更具建设性的实践来自学界。中国美术学院新开设的“多元审美”公选课上，学生们要完成“发现身边十种非标准美”的作业。授课教师李明的观点发人深省：“我们反对的不是美，而是美的垄断。”在商业领域，某国产护肤品牌大胆起用普通消费者拍摄广告，

销售额反增 40%，这或许预示着市场正在用脚投票。

在这个图像泛滥的时代，或许最叛逆的行为就是允许自己普通。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分享未经修饰的生活片段，当算法开始为多样性留出空间，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场静悄悄的审美革命——不是通过对抗，而是通过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被看见的。

责编 金俊志 苏嗣淼

5. 没有终点的邮路，永不褪色的抵达

——《那山那人那狗》影评

张文焱

雨后空蒙，青山雀语，断断续续的山间石板泛着微弱的光芒，隐约印着二人一狗匆匆的泥脚印。绣有“人民邮箱”四字的沉重邮件包，日复一日被太阳炙烤、被风雨打磨到褪了色的斗笠帽，还有永远奔走在前面、嘴里喘着粗气的黄狗“老二”，都是陪伴老邮差坚守一辈子邮路的忠诚伙伴。而如今，一位年轻人将接过这承载着无数故事和使命的邮路，续写新的篇章。这段故事便是来自我国上映于1999年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

看了《那山那人那狗》我才知道，悠悠铃音，不仅鸣响于黄沙漫卷时满载货物的骆驼商队的旅途中，也回荡在山涧野林间默默跋涉的两代邮差的征程里。在中国湘西南的层峦叠嶂间，一条蜿蜒230里的邮路，串联起二人一狗的呼吸与心跳。霍建起导演的《那山那人那狗》以水墨画般的镜头语言，将父子两代乡邮员的足迹镌刻成一首关于责任、理解与情感传承的散文诗。它以湘西群山为幕，讲述一位即将退休的深山乡邮员，带着初次接班的儿子与陪伴自己半生的黄狗，踏上最后一次送信之旅。同时，这也是父子情感隔

阂消融的过程。导演霍建起通过自然景观与人文细节的结合，将邮路升华为传统价值传承的象征符号，这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湘西故事，在试图教会我们什么？

在当下物欲横流的快时代，或许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影片中的父亲为何默默坚守邮路数十载，徒步翻越绵绵群山，独自对抗无尽寂寞，更别提到头来他没有得到一封正式的嘉奖信。即便如此，老邮差也坚守着心中最纯粹的“邮路”。在群山与云雾织就的窄小天地中，父亲的邮包存放着湘西褶皱里千万户人家日思夜想的名字。影片的核心矛盾在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现实。老邮差数十年如一日徒步送信的行为，在“时间就是金钱”的现代效率观中显得格格不入。这种坚守并非源于制度要求，而是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情感联结。村民对邮差的依赖、盲眼阿婆对“无字家书”的期盼，揭示了基层社会运行中不可替代的人文纽带。2024年3月，日本邮政宣布将削减全国30%的传统邮递员岗位，全面推广无人机配送系统。这一决策旨在应对劳动

力短缺和提升物流效率，但引发了社会强烈争议。这些邮局多分布于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承担着为老年居民递送养老金单据、医疗通知和亲人信件的重要职能。随着数字化服务的普及，年轻人普遍选择在线支付和电子邮件，传统邮政和邮递员被视为“低效的累赘”。然而，此举引发当地老年群体的强烈抗议——许多人无法熟练使用智能设备，邮局不仅是信息传递的渠道，更是他们与外界保持情感联结的唯一纽带。日本乡村邮递员岗位的削减，象征着现代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对人文关怀的碾压。当效率至上的逻辑将传统邮政定义为“过时的服务”时，被忽视的正是电影中老邮差所承载的“体温捂热的字句”和“绝望中的希望火种”。老年居民的抗议揭示了数字鸿沟加剧下的情感剥夺：算法可以精准推送信息，却无法替代邮差亲手递送家书时带来的慰藉。正如电影中“山里人几天不见邮差就要心慌”，现代社会的“高效”正在剥离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守望，使那些依赖传统沟通方式的群体沦为时代的孤岛。日本《朝日新闻》曾指出：效率背后，是“最后一公里”的情感断链。

当算法把人际关系氧化成点赞数与关注度的今天，那些需要慢慢等待、细细摩挲的情感质地，正在数字暴雨中生出一层冷漠的铜绿。正如2023年2月，美国犹他州起诉Meta公司，指控其旗下Instagram和Facebook通过算法刻意向青少年推送极端内容，间接导致焦虑、抑郁及身体形象障碍比例激增。该案深刻地揭示了社交媒体将人际关系“氧化为点赞数”的异化过程，印证了流量时代无情感的数字互动对人文情感的严重破坏。影片的深层意义正是在于对现代文明

的反思。当数字技术将人际交往简化为数据交换时，邮差父子用脚步丈量的不仅是地理距离，更是维系传统社会的情感维度。老邮差递交给儿子的邮包，象征着超越物质载体的精神传承。这种传承通过三代生命体（父亲、儿子、老狗）的接力得以延续，暗示着传统价值观在时代更迭中的生命力。

在全球化与技术革命并行的当下，《那山那人那狗》提供了重要的反思视角。邮差父子对抗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艰险，更是现代化进程中人文价值的流失危机。影片结尾新一代邮差继续行走的画面，既是对传统职业精神的致敬，也提出了如何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守护情感联结的现实课题。这种通过具体职业展开的文明思考，使影片成为解读中国社会转型的典型文本。

在飞机高铁飞速穿梭世界半边天的今日，《那山那人那狗》中的邮路更像是一面照见现代性的明镜。影片用极致克制的东方美学完成了对“快”时代的情感审判。那些需要三天两夜徒步送达的信件，那些藏在褶皱信纸里的无尽思念，都在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抵达，不在于物理速度，而在于心灵能否在跋涉中沉淀出生活的真谛。青山依旧在，邮路永不绝。新时代的邮路也当由我们铭记并传承下去。或许正如木心笔下“车马邮件都慢”的往昔，这条邮路解答的，终究是一个民族关于坚守、责任与爱的永恒命题。当新一天的晨光掠过儿子肩头的邮包，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父子间情感隔阂的跨越，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在时代巨变中，对精神原乡坚守传承与深情回望。

责编 王玉宝 苏嗣淼

6. 旁观者的深渊

——河道英视角下的《黑暗荣耀》权力寓言

杨赫祺

作为《黑暗荣耀》中最克制的观察者，河道英始终以上位者姿态站在风暴边缘。这个被资本驯化得近乎完美的财阀化身，恰是整部剧集最精妙的叙事切口——当文东恩以伤痕为武器撕开血淋淋的阶级壁垒时，河道英的存在，恰似一面镀金边框的镜子，映照出韩国社会光鲜表皮下的集体性溃烂。

一、伪神的面具：精英阶层的道德真空

作为贤星集团掌门人，河道英的办公室坐落在汉江两岸最昂贵的写字楼顶层。透过落地窗俯瞰首尔时，他的视线与十八年前文东恩蜷缩在体育馆储物柜里的视角形成了残酷的对称。

当他第一次见到文东恩，目光扫过她廉价大衣下摆的线头时，嘴角浮起0.1秒的冷笑。这几乎难以捕捉的表情，暴露了上位者与生俱来的傲慢。然而当棋局在两人之间展开时，黑白色棋子碰撞出的声响，让河道英第一次在绝对掌控的领域感受到失控的震颤。文东恩落子的手带着贫民窟的粗粝感，却能在十九路经纬间编织出比资本市场更血腥的围剿，这使他精心构筑的认知体系

被瓦解。

二、共谋者的悖论：沉默背后的利益算法

发现妻子朴妍珍校园暴力证据的那个雨夜，河道英站在智能系统调控的恒温书房里，手指反复摩挲着U盘的金属边缘。监控录像里的文东恩像只被剥皮的野猫，而那时的朴妍珍举着卷发棒的样子，与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晒亲子瑜伽的贤妻形象完美重叠。这个发现本该引发道德地震，但在河道英的价值换算公式里，婚姻是资产重组项目，女儿是家族信托产品，而真相不过是需要风险对冲的变量。

他选择用昂贵的丝巾包裹住U盘，这个动作充满黑色幽默的仪式感：财阀的罪恶必须用奢侈品来消减，正如他们用慈善晚宴洗白黑金。在私人会所与文东恩的对峙中，他摇晃酒杯的节奏始终精确：“你要的不仅是复仇，而是重新制定游戏规则。”冰块撞击玻璃壁的声响中，两个不同阶层的聪明人达成了契约——他默许文东恩摧毁朴妍珍，如同默许旗下建筑公司拆除贫民窟，只要能够保护核心资产（女儿艺率），其他的

足为道。

三、金丝笼的裂缝：父权神话的自我反噬

在女儿艺率的基因检测报告面前，河道英终于撕破了完美丈夫的面具。这个永远用西装武装自己的男人，此刻暴露出西装衬里般脆弱的真实质地。他冲进汉江豪宅的儿童房，用游标卡尺测量女儿的眼距角度，试图从混血特征中寻找自己血脉的痕迹。这个荒诞场景解构了财阀家族最珍视的“纯血”神话——当他在股东大会上用英韩双语演讲时，女儿正因种族歧视在幼儿园哭泣，资本帝国精心打造的全球化人设，在基因真相前碎成一地玻璃碴。

深夜独自驱车前往棋院的路上，河道英摇下车窗，让汉江的腥风吹乱他每早花费二十分钟打理的发型。文东恩留下的残局在棋盘上狞笑，他突然看清自己不过是更高段位棋盘上的棋子。当他在吞下冷掉的紫菜包饭，舌尖尝到的不是便利店食品的廉价感，而是二十年来吞咽的无数妥协形成的苦味沉积层。那个瞬间，西装革履的守护神终于承认，自己早就被异化成食罪者。

四、镀金时代启示录：困在系统里的所有人

河道英最终选择带女儿远走伦敦，像极了2020年疫情初期财阀们包机逃离首尔的现实映射。希斯罗机场的自动门开合间，他最后一次回望这个亲手参与建造的罪恶系统：文东恩在废墟上点燃的火光，朴妍珍在监狱里崩溃的尖叫，还有那些被他拆除的城中村里盘旋不散的哭嚎，都在提醒这位前既得利益者——没有人能真正逃离自己参与设计的牢笼。

《黑暗荣耀》通过河道英的视角完成了一场精妙的社会学手术：当文东恩用肉体伤疤对抗世界时，河道英的精神溃烂更具普遍意义。他的每一次沉默，都是对系统性暴力的纵容；他的每一个得体微笑，都在加固压迫的钢筋结构。在贫富差距达到临界点的现实社会，所有精致利己主义者都是同谋。当大结局的字幕升起时，河道英的故事仍在继续：在伦敦金融城的玻璃幕墙后，在苏黎世私人银行的VIP室里，无数个河道英仍在用资本的语言重写善恶的边界。而文东恩们留下的真正遗产，或许就是撕开那袭华美长袍，让所有寄生在特权体系里的“体面人”，都不得不直视袍子内里爬满的虱子。

责编 王玉宝 苏嗣淼

7. 《奥本海默》：诺兰的传记电影表达

张嘉妮

影片《奥本海默》改编自凯·伯德与马丁·舍温 2005 年合著的传记《美利坚的普罗米修斯》，通过三小时的史诗篇幅全景式展现了主人公奥本海默的生命历程。影片采用多线叙事结构，在历史事件与人物心理的双重维度上层层递进，将科学家内心的道德困境与哲学思考具象化为银幕语言。导演克里斯多弗·诺兰在这部传记作品中展现了他独特的影像表达。

一、人物传记片：人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奥本海默》是诺兰拍摄的第一部以真实人物为中心的作品。他透过《奥本海默传》发现了奥本海默性格里的不确定性——不论是他前后矛盾的观点、内在秉持的种种悖论、做事的动机还是他的行为本身。他认为这与虚构小说中的人物特性类似，即“小说里的主人公往往态度暧昧、自欺欺人，而奥本海默也是如此”。

“你看到超越这世界的奥秘，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世界正在重组新秩序，这是属于你的时刻。”“我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愧疚是他的勋章，他想要成为殉道者。”“你是美国的普罗米修斯，你赋予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

这些关于奥本海默的证词被性格、身份迥异的人物在不同时期说出，看似矛盾的形容在奥本海默身上统一起来，构成了他。这些复杂、激烈的矛盾被战后时局扩大，演变成 1954 年的听证会上狡猾老辣的检察官罗杰·罗布的那句诘问：“为什么你 1945 年毫不困扰，1949 年却充满了道德顾虑？”

奥本海默对于态度转变的回答是：“我本以为会结束战争，但是之后却发现我们在选择武器时没有底线。”他坦诚地说出自己原本构想的将科学精神与政治行动统一起来的正义目的，在投弹之后碎了一地，随之而来的道德与人性的拷问，让他无法再像洛斯阿拉莫斯时期那样自洽。此时，环绕在奥本海默身边的不仅有人群的欢呼声和掌声，也有哭泣和悲鸣，一如他分裂挣扎的内心世界。

二、创作剪辑技巧：黑白与彩色影像穿插

诺兰在《奥本海默》中展现了他惯常的剪辑技巧，即采用彩色与黑白两个影像画面展开叙事。影片的主要内容——两个听证会的内容双线并行：各人物在原子弹研发（裂变/Fission，奥本

海默视角）和氢弹研发（聚变/Fusion，奥本海默对手、政客施特劳斯视角）两条并进的线索中交错、密集地发声。彩色影像代表奥本海默的主观视角，以1954年安全许可听证会为起点，回溯其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经历；黑白影像则对应政客施特劳斯的客观视角，聚焦1959年其内阁提名听证会。两个画面在内容上紧密衔接，环环相扣，将奥本海默的私生活、政变的阴谋与曼哈顿计划主线缝合在一起，一步步引出后文，通过证词的反转与记忆的错位制造悬念。

作为一部传记电影，《奥本海默》以人物的结局开场，面对着审查他的安全许可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奥本海默开始回忆起自己这一生的经历。这种倒金字塔式的叙事结构，将人物的晚年困境作为叙事起点，通过奥本海默的主观回忆展开其生平轨迹。但影片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倒叙，而是更接近于诺兰标志性的非线性叙事——以各种闪回手法制造循环。与电影中常见的闪回手法所追求的连贯、封闭的循环不同，《奥本海默》中的那些错乱的时间圈环恰恰瓦解了线性的时间，当观众自己在时间的迷宫中重新拼贴奥本海默的生命轨迹时，实际上也完成了对历史叙事本身的解构与重构。

三、隐忧——人工智能的“奥本海默时代”

影片中，爱德华·泰勒通过量子计算推演出链式反应可能焚毁大气层的骇人结论。虽然经过后来的反复计算，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低，可能

接近于零，却依然没有完全排除毁灭的可能性。讽刺的是，理论上的灭世风险始终未被彻底排除，“三位一体”试爆按钮仍被按下，面对这样“未知的风险”奥本海默等人选择薛定谔式的听天由命。直到核爆之后，所有人才确认这件事不会发生。但是，核弹试爆的时刻我们很幸运，未来的无数次，我们是否能延续幸运？

奥本海默与爱因斯坦在池塘边对话谜题直到影片的最后一分钟才揭晓。当奥本海默凝望着池塘里的涟漪，然后以极具震撼力的口吻陈述道：“毁灭整个世界……我相信我们真的做到了。”全片的叙事高潮出现，这位科学家毕生的研究或许并非单纯聚焦于核能的和平利用，而是始终暗含着对宇宙终极命运的哲学追问。诺兰在《奥本海默》专访中提到：“电影中的故事不只是历史，现实中还有很多战争和足以改变世界的研究正在继续。”核爆作为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重大灾难与隐患，就像影片中从未消散的蘑菇云一样成为永恒的阴影困扰在人类心头。

当我们审视当下仍在持续的军事冲突与前沿科技研发时，不得不直面一个命题：在核武器小型化扩散与生成式AI对人类社会的颠覆式变革中，人类是否正重蹈历史覆辙？那些被按下的“启动按钮”背后，是否同样高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般的文明存续风险？“另一个奥本海默时刻”已然到来。

责编 王玉宝 苏嗣淼

8. 被盲盒撬动的童年

——警惕“小马宝莉”背后的潘多拉魔盒

宁艳琪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当校园周边的文具店逐渐沦为孩子们心中的“抽卡战场”，当零花钱在塑料包装的窸窣声中悄然流逝，一场以“小马宝莉”卡牌为载体的童年消费革命正悄无声息地上演。这场看似仅仅是一场集卡游戏，实则背后隐藏着资本精心设计的欲望迷宫。未成年人，作为这场游戏的主体，正用他们纯真的心灵和宝贵的童年时光，为成年世界的商业法则支付着昂贵的学费。

盲盒，这个看似简单的商品，其背后到底蕴含着何种魔力？它其实是一种精准狙击人性的斯金纳陷阱。心理学中的“间歇性强化”原理在卡牌盲盒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每一次撕开包装的瞬间，那份期待与可能随之而来的失落，就像是一场微型的心理博弈，刺激着孩子们的多巴胺分泌，让他们沉醉于这种不确定的快感之中。当孩子们不惜重复购买，只为换取一张“SSR卡”的稀缺快感时，他们其实已经踏入了行为心理学家斯金纳所设计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实验场，无法自拔。

而在校园这个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中，卡牌更是早已异化为一种“硬通货”。稀有卡成为划分社交阶层的标尺，而重复卡则成为可供交易的“货币”。这种扭曲的价值体系催生出了一条令人心惊的生态链。在上海某中学，就曾曝出学生用期末试卷答案来兑换限定卡的丑闻；而在杭州，更有小学生偷刷家长信用卡万元购卡的极端事件。当集卡变成了一种攀比竞赛，孩子们本该在这个年龄段培养的理性消费观和延迟满足能力，正在被即时快感消费主义无情地啃食。

然而，盲盒的魔力并不仅仅局限于校园内的未成年人。在大学校园中，盲盒消费同样呈现出一种过热的趋势。对于许多大学生而言，盲盒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消费热点和社交话题。他们沉迷于拆盲盒的惊喜感，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去购买各种盲盒产品。从最初的文具盲盒、玩具盲盒，到后来的美妆盲盒、服饰盲盒，盲盒的种类越来越多，价格也水涨船高。然而，这种过度消费的行为却往往忽视了自身的经济状况和消费需求，导致许多大学生陷入了经济困境和消费焦虑之中。

面对盲盒消费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我们不得不反思：到底谁是这场消费革命的幕后黑手？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具有赌博性质的商品”，但商家却通过种种手段规避监管。在广州某批发市场，调查发现标价 5-200 元不等的卡包均未设置年龄提示，而号称“隐藏款 0.69%爆率”的卡盒概率公示更是形同虚设。这些商家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攀比心理，将赌博机制巧妙地包装成寓教于乐的收藏行为，从而实现了盈利的最大化。

盲盒不能盲目纵容，无论是孩子的童年还是大学生的青春，都不容“通货”异化。要筑起制

度的铁门，加强对盲盒市场的监管力度，规范商家的经营行为；同时，也要构建教育的心门，引导孩子们和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最后，还需要打造商业的防护门，推动盲盒行业健康发展，让盲盒回归其本应有的娱乐本质。

当资本将人性的弱点转化为盈利的密码时，守护童年的战役和青春的消费理性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消费纠偏。面对被盲盒异化的童年和青春，我们需要在卡片飞舞的喧嚣中重建价值坐标。毕竟，比集齐一套梦幻卡牌更重要的，是守护孩子们和年轻人完整的人格拼图，让他们能够在健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责编 罗奕 江志强

9. 灰绿色的时代

——浅评莫言《蛙》

邓雅妮

《蛙》作为莫言打磨近十年的作品，是中国文坛上极具代表性的著作。这部作品触及了一个在当时极其敏感的话题——计划生育，虽说现在我们已进入三孩时代，面对的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但计划生育离我们并不遥远，其对于社会和人民造成的影响之深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莫言在后记中所说：“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尤其复杂，它涉及到政治、经济、人伦、道德等诸多方面。尽管不敢说搞明白了中国的计划生育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国，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国。”

《蛙》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九幕话剧组成。故事主线讲述了“姑姑”作为60年代一名农村妇科医生波澜壮阔的一生，由这一位时代洪流中的“奇女子”所牵扯出来的众生百态也令人深思。

从人口爆炸增长的50年代，姑姑掀翻老娘

婆田桂香，接生胎位不正的陈鼻而一战成名，飞一般的自行车跑遍了高密，成为家家户户的“送子观音”。在那个生育激增的年代，姑姑满手鲜血地托举起了一个又一个新生命，在接生了一千个孩子后姑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无穷无尽的生育所带来的，是资源与人口的严重不对等，国家一声令下，计划生育开始施行，姑姑作为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更是一马当先。可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曾经的“活菩萨”姑姑就这样成为村民们口中的“活阎王”。

自此姑姑这一人物的矛盾点便出现了，医生本应是救死扶伤的职业，可姑姑手上的鲜血一边是芳香的，一边是罪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到来使她从为人接生的“娲”，成为引流无数“娃”的政策践行者，被无数声凄凄如婴啼的“蛙”鸣吓得屁滚尿流。早年间，姑姑天不怕地不怕，可晚年时却嫁给泥人匠，做了两千多个泥娃娃来抚慰内心的罪恶感。“女娲”是职业赋予姑姑的荣光，“蛙鸣”却是时代带给姑姑的创伤。

其实本书中有罪恶感的人不止一个，“我”，也就是蝌蚪，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其实一直在为这个时代浓重的封建底色开脱。如果说姑姑这一形象代表了当时的生育工作者，那么“我”就代表着接受了教育却仍残留传统思想糟粕的知识分子。如在面对续弦小狮子给“我”偷偷找代孕女生儿子时，“我”竟然将对前妻的愧疚寄托在那个代孕得来的孩子身上，说服自己这是那个被流掉的胎儿转世。诚如“我”这样接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也无法抵挡“传宗接代”的诱惑，冒着被处分的风险，即使家中已有一女也要拼“独苗苗”，这又何尝不是时代的局限。

莫言以魔幻现实主义著称，除了人物形象的设计，此书中也有许多荒诞的故事情节。比如代孕女是“我”少时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姑姑和小狮子在接生时高喊男女平等却依然为“我”的传宗接代绞尽脑汁。而最能体现现实的魔幻的，是我在施舍流浪街头的陈鼻时，所施舍的一百元被少年抢走，追赶时扎破了手、弄坏了别人的车，

最后还被倒打一耙说成欺负小孩，警察来了也只能不了了之自认倒霉。由施舍时的高高在上瞬间跌落到后来的狼狈不堪，这样荒谬可笑转变，不过是“我”从自己创造的道德高地上被现实打落下来了，自认为用钱财跟他的女儿为“我”代孕划上了等号。可是在剧情的发展中，不管是“我”还是姑姑和小狮子都没有在意代孕母亲陈眉，她仿佛变成了一个工具，无权无势，轻而易举就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这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对女性价值的轻蔑。

水性好的孕妇被逼死在水中，王胆舍命生下的孩子是女孩，小狮子抱养半年的女孩成为她生儿子的代孕工具……这些被时代逼迫的痛苦让灵魂胆寒，可偏偏这样的痛苦建立在“生育”这样有生命力的事情上，如何不让人感到唏嘘、感到荒谬、感到魔幻。罪恶是灰色的，生命是绿色的，青蛙是灰绿色的，一声声如同蛙鸣的婴啼是时代之轮转动的足音，这样一个灰绿色的时代也许就是莫言想要向读者展示的魔幻的现实。

责编 罗奕 江志强

10. 警惕道德绑架，重塑文化自信

——被异化的文化支持：刷票房等于爱国？

丁靖航

在今年春节档电影市场热潮中，现象级爆款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以惊人的票房表现，成为今年春节档的吸金王。据统计，《哪吒2》在春节期间平均每日增长7亿元票房，以超过70%的票房占比拉动春节档向上攀升。截至目前，《哪吒2》票房已经达到155亿元当之无愧成为中国票房榜冠军，此外，《哪吒2》出海票房超4894.2万美元，暂列全球影史票房榜前5。

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正在发生：部分观众将观影行为等同于爱国宣誓，甚至在社交平台形成“未观影即不爱国”的话语压迫，还有不少粉丝无脑刷票房为“小哪吒”冲榜，网红博主请民工看电影只为引流等乱象层出不穷，这导致《哪吒2》引发的舆论涟漪超出了电影本身的艺术范畴。这种将文化消费异化为道德考量的现象，不仅模糊了艺术鉴赏与价值认同的边界，更折射出公众场域中值得警惕的情感动员模式。当支持国产电影从文化自觉演变为道德义务，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化自信的真正内涵。

一、文化认同的应然逻辑：从自发共鸣到强

制共振

支持国产电影本应是文化自信的自然流露。当观众被精良用心的制作、动人震撼的故事所打动，自发走进影院为优质内容喝彩，这本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曾在2019年以黑马之姿斩获50亿票房，正是凭借其突破性的视觉呈现与情感共鸣赢得观众真心认可。像去年的现象级3A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不仅在国内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为整个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国际上也斩获了多个重要奖项。这种基于作品质量的认同，才是文化自信最坚实的根基。

将电影票根视为爱国证书的荒诞性，在于其陷入了符号消费的认知陷阱。这种思维模式将复杂的情感认同降维成可量化的行为指标：仿佛票房数字能自动兑换成文化软实力，观影人次可换算为民族凝聚力。这实质上消解了文化支持的真正价值。爱国主义作为深沉的情感认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判断题。当支持行为被简化为“买票即爱国”的粗暴等式，不仅让文化消费失去了审美愉悦的本质，更可能引发公众对爱国主义的

逆反心理。

这种异化现象实则暴露了深层的文化焦虑。

当《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好莱坞改编作品引发文化挪用争议时，公众对本土文化 IP 的保护意识自然增强。但保护不应等同于排他性占有，更不该异化为“赎罪券”式的消费补偿。日本吉卜力工作室的全球影响力证明，真正的文化自信无需道德加持——宫崎骏从未呼吁观众为“爱国”走进影院，但《千与千寻》中蕴含的东方哲思自会赢得世界共鸣。

文化强国的建设需要理性包容的公民社会。历史经验表明，文化自信的构建不能依靠道德胁迫，而应源于对文化产品真正的欣赏与认同。日本动漫、韩国影视的全球传播，依靠的从来不是国民的义务性支持，而是作品本身的文化穿透力。当我们在讨论某部电影时，应该回归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化内涵，而不是陷入非黑即白的立场之争。

二、重构健康生态：超越非此即彼的文化想象

破解困局需要建立多维度的认知坐标系。首先应区分文化保护与文化封闭的本质差异：前者是通过提升创作力参与文明对话，后者则是筑起审美高墙的自我禁锢。追光动画 CEO 王微指出：“观众用脚投票的时代，好故事才是最好的爱国表达。”

其次需警惕将文化产业过度政治化的倾向。北京电影学院学者戴锦华强调：“电影首先是艺术，然后才是商品，永远不该成为意识形态的计量器。”真正健康的电影市场，应当允许观众基于个人审美自由选择，创作者依靠作品质量赢得掌声。当我们为国产电影加油时，更应保持理性克制的态度——既对优质内容不吝赞美，也坦然接受市场检验的客观结果。唯有如此，才能让文化自信摆脱道德绑架的阴影，在自由多元的土壤中生长出真正动人的文化之花。

责编 罗奕 江志强

11. 围城高筑，亦需让心启航

——读《围城》有感

秦雪霁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围城围住的不光是人，更是心。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风格独特，集幽默与讽刺为一体，被誉为“新儒林外史”。该书主要描写了抗战时期社会动荡，主人公方鸿渐爱情，事业，家庭，人生的种种坎坷与不顺，塑造了以方鸿渐为主的一类知识分子的群像，展现了那个时代他们所面临的婚姻事业等困境。虽不见围城，却处处皆是围城。但人生即是如此，由一个又一个围城拼凑而成，冲出一个围城，便又到达了另一个，我们总是被禁锢在自己给自己打造的一个又一个围城当中，只有真正敢于面对自己，才能飞跃高墙，让心飞翔。

钱钟书在《围城》中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刚柔并存的孙柔嘉，有纯真安然的唐晓芙，还有工于心计的苏文纨等等，但最让我深有感触的还是文章的主人公方鸿渐。方鸿渐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他被动无能，意志不坚，面对

残酷黑暗的社会他只会一味接受，而缺乏与之对抗的勇气，只能随波逐流。但同时他又在思想上开始觉醒，极好尊严，甚至宁可购买假文凭。其实给自己围上重重城墙的人一直都是他自己，人性深处总有一种可悲的东西，就是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总是艳羡他人。

围城之高，高在婚姻。主人公方鸿渐有四段感情经历，所遇皆不相同，却皆刻骨铭心。他在爱情面前缺乏主见，明明钟情于唐晓芙，却又怯懦畏缩。别人说过的话便成了自己要做之事，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便在心中筑起层层高墙。明明自己对苏文纨不是真正喜欢，但大家认为他喜欢苏文纨，便就顺从下去从不辩解。明知孙柔嘉并非最佳人选，却也还是娶了她，亲手将自己关在了自己筑就的婚姻高墙之中。但是世上没有完美的伴侣，无论和谁在一起，都需要努力地磨合，在包容与谅解中完善自我，让心启航。

围城之深，深在事业。方鸿渐辗转三地，做了三份全然不同的工作，银行职员，大学副教授，

报社编辑。这三份工作，其实都不是他理想中的工作，因为没有一份让他真正实现了自我价值，他只能一次又一次跌倒爬起，在重拾希望后，最后又终于失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有着巨大鸿沟，可能穷其一生也无法跨越，我们只能尝试与自己和解，认清自己，勇于面对自己。吉鸿昌有言：“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人生没有最优解，每个人都是初来人间，你走的每一步便是以你为名的答案之书。

围城之固，固在人心。张皓宸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能阻拦你的只有你自己。”大家都笑言，初读不知书中意，再读已是城中人。方鸿渐是这样，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不论是学业，还是婚姻事业，方鸿渐始终都深陷于自我的禁锢之中。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同，终其一生都活在他人的期许之中。我们都听过太多的道理，却仍旧过不好这一生。杨绛先生有一句话我很喜欢，“这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就像是散落在天边的星星，我们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勇敢一些，要相信凭借自己，我们也照样可以发出耀眼光芒。

想想自己，身处围城中，我们也会羡慕围城之外的美好，但其实城外何尝又不是另一座城呢。我们也常常会羡慕自己的身边人，羡慕他人的生

活比自己美满，其实我们也只是看见了玫瑰的花香，却也忘记了伴随着花香的还有荆棘与刺。人们总是对得不到的东西充满幻想，却总是忽略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直到失去才懂得珍惜，却已为时已晚。小时候总是渴望长大，可以独当一面。可真正长大后，却又开始怀旧起儿时的纯真美好，无拘无束。人们也常常被他人意见左右，让他人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例如我上大学选志愿，我第一想法竟不是我喜欢什么，我想学什么，而是学什么他们会对我刮目相看，什么最火学什么。盲目跟风的风潮已经屡见不鲜，但其实我们的人生是活给自己看的，而不是给别人，无论好坏，也只是自己的人生。我们需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人云亦云，命运需要勇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拼尽全力后纵使结果可能不那么如人所愿，但是至少我们为此拼搏过，努力过，方可不留遗憾。人的一生，需要把握在自己手中，你是你筑梦路上唯一的高墙，越过去，全世界都能看见你的光亮。

纵使围墙高筑，也不能抵挡我们热爱生活的心，活在当下，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也珍惜世上唯一的自己。世界的美好就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间，勇敢战胜自我，走出围城，让心启航。

责编 罗奕 江志强



QINGNIANBIANQIANBU

12. 裂隙中，依旧向阳生长

——从女性主义电影看女性叙事成长

范诗涵

近日，清明档电影上新，其中女性向电影《向阳·花》上映一周票房超一亿，作为一部聚焦刑满释放女性生存困境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既因深刻的社会洞察赢得赞誉，又因叙事手法和角色塑造的争议性遭遇两极评价。而围绕它的讨论，恰恰折射出当下女性主义电影在艺术表达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复杂张力。

曾几何时，女性角色在银幕上多是被凝视的客体、剧情的点缀或是男性英雄的奖赏，而今天，电影市场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性别革命。银幕开始从“男性凝视的橱窗”蜕变为“女性经验的镜面”，那些曾被消音的故事，正以影像为锤，叩击着刻板印象的锈锁。

《向阳·花》作为冯小刚转型之作，将镜头对准了刑满释放女性这一社会边缘群体。影片中赵丽颖饰演的高月香为给失聪女儿挣一副人工耳蜗，她将人生押进牢狱，出狱后却面临更残酷的社会排斥——勤恳做工却因带前科烙印而被辞退，无良老板把她们逼到抡酒瓶自卫。这种对

底层女性生存困境的赤裸呈现和这类被主流叙事长期放逐的“不完美女性”形象，撕碎了传统银幕上“圣女”与“恶女”的二元面具，将性别困境的复杂光谱曝晒于烈日之下。

此外，《好东西》中都市女性的自嘲式觉醒，《芭比》对父权符号的戏谑解构，乃至韩国《82年生的金智英》引发的全民论战，共同编织出一场跨国界的性别叙事共振。这种共振背后，是数字时代女性声音的全球性放大，也是电影作为大众艺术对社会变迁的敏锐捕捉。

然而，女性主义电影在表达过程中也面临诸多困境与争议。《向阳·花》的案例尤为典型。有评论尖锐指出：“《向阳·花》暴露的是尽管女性题材热度上升，但主导创作的仍多为男性导演，该片的争议或许是男性创作者在女性议题上的局限。”这种局限体现了当男性导演处理女性题材时，往往难以避免将女性角色工具化、奇观化的倾向，即使出于善意，也可能落入“拯救女性”的父权思维陷阱。

《好东西》虽然由女性导演执导，但也面临另一种质疑——有观点认为它“将所有的矛盾在调侃讽刺中自我消解，实际也彻底解构了包括性别在内的各种严肃命题”，成为一种“现实虚妄”的呈现。当《好东西》通过“小确幸”式的情绪价值取悦女性观众，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性别问题的严峻性？这类困境并非中国独有，当《芭比》被讽为“粉红平权快消品”，当《初步举证》因过于尖锐遭遇市场冷遇，全球影人都不得不直面同一命题：如何在媚俗与说教间寻得第三条路？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女性主义电影往往被期待承担过重的社会使命。当《向阳·花》试图展现“刑满释放女性的生活状态”时，它不仅要面对艺术真实性的考验，还要承受“是否足够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审查；当《好东西》探讨“月经羞耻和性别教育”等社会禁忌话题时，它既被赞扬为勇敢，也被指责为“过于明显地试图通过打拳和女权话题来吸引观众”。这种双重标准反映了社会对女性题材的异常敏感——同样的艺术瑕疵，在女性主义电影中往往会被放大为“主义不纯”的证据。

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电影作为艺术形式有其局限性，不能也不应承担解决所有性别问题的责任。女性主义电影可以揭示问题、激发思考、提供情感支持，但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制度、教育、经济等多方面的协同努力。例如，《好东西》虽然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虽因母职放弃了心爱的职业，但始终没有迷失自我”的励志

故事，但现实中更多女性可能因结构性障碍而无法实现这种自我坚持。我们或许应该允许女性主义电影有试错和探索的空间，而不是要求每部作品都成为完美的性别宣言。

真正的破局，或许藏匿于创作权力的再分配。正如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所言：“女性主义为电影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视角鼓励女性电影创作者用她们独到的视角和声音，在电影中展现女性的经历和构建女性的话语。”

同时，我们也鼓励女性主义电影的健康生态中多元声音的共存。既有如《向阳·花》这样由男性导演尝试的女性题材，也有如《好东西》这样女性作者电影；既有商业类型片的探索，也有艺术电影的尝试。关键在于，这些作品是否真正尊重女性经验的复杂性，是否能够超越刻板印象展现女性的主体性。《向阳·花》中赵丽颖的“毁容式”演技，与《好东西》中都市女性的精致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恰恰证明了女性处境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提醒我们：女性主义不是单一真理，而是无数真实生命的集合。

凝视《向阳·花》中那些挣扎向前、向阳而生的女性形象，回顾《好东西》里三位不同世代女性的成长轨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银幕上的故事，更是一个正在觉醒的时代精神。从《好东西》引发的两极讨论到《向阳·花》被质疑“打了低分”的争议，这些声浪本身便证明了女性叙事已经从不被看见走向无法忽视。它不必完美，但必须真诚；不必激进，但必须清醒。

站在 2025 年的门槛回溯，从《热辣滚烫》《好东西》到《还有明天》《向阳·花》，女性主义电影已经走过了从边缘到主流的漫长道路。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元、更深刻的女性表达——不同阶级、年龄、种族、性取向的女性故事都有机会被讲述，甚至女性不仅能成为银幕上的主角，也能成为镜头后的主导力量。

水泥缝隙中的野花无需温室垂怜，它们用根系讲述另一种生存哲学——在结构性压迫的裂

缝里，每一次绽放都是微小而磅礴的革命。或许某天，当电影艺术真正拥抱了女性的全部复杂性，当女性不再需要“主义”作为前缀，当所有边缘叙事都自然流淌进银幕中央，它也将更完整地呈现人性的丰富光谱。

在光影交错处，我们终将找到那个性别不再定义命运的未来——在那里，每个灵魂都如同向阳花，朝着自由舒展枝叶，无论土壤是沃野还是荒原。

责编 王玉宝 苏嗣淼

▶ 青年评论

HNNU YOUTH MEDIA



本版责编：青年编辑部

版式设计：视觉艺术部

本期 2 版 总第 9 期

2025 年 4 月 25 日 星期五